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7.05.015

夏道平经济思路的演进及其原因

李晓波^{1,2}

(1.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2.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大陆赴台学人夏道平以主张自由经济而闻名,但其走上自由经济的思路却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早年在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求学时,夏道平就已了解到自由经济,不过毕业后不仅没有继续追随这种思路,相反主张对自由经济进行相当的修正。赴台后任《自由中国》主笔期间,转而揭橥奥地利学派,转向自由经济。《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通过潜心译介奥地利学派等得以深入探索自由经济。这种经济思路演进的原因,固然有个人的努力和自由中国社学人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奥地利学派的给养。

关键词:夏道平;统制经济;自由经济;演进

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7)05-0108-12

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中,随着政治制度选择问题的出现,经济制度的选择问题逐渐呈现出来,并且越来越重要。不同的学人有不同的选择,同一个学人的选择可能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其思路无外乎自由经济、统制经济、纳粹经济和计划经济。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大陆赴台学人夏道平的经济思路^①。夏道平见证了台湾政治经济转型的历程,以主张自由经济而闻名,但其走上自由经济的思路却有一个在上述四种类型中选择的曲折过程。

一、大陆时期经济思路的演进

夏道平1906年5月生于湖北大冶保安镇,保安镇距离当时享有“东方芝加哥”之称的汉口很近,民间有“金汉口,银保安”的说法。夏家历代经商,较为富有。祖父和大伯虽是商人,但多读了一些书,是镇上受人尊敬的好绅士。他出生的那一年,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正式废除,此后在一些较大的城市新式学堂发展很快,还出现了留学热潮。不过,等到他上学时,父辈仍然希望他以后继承家业,成为一名好绅士,所以还是为他请来了家

塾老师,教授旧学。四位家塾老师中,他最难忘的是杜星符(清末民初名儒张裕钊的再传弟子),杜星符“虽未受过新制教育,他却知道科学新知的重要,经常劝我父辈要让我们去考新制学校。”^{[1][93]}家塾多年,他读的都是线装书,遍及经史子集的重要部分,熟谙作文谨严的桐城义法。由于国文功底深厚,1924年考取当时师资阵容强大的武昌国学馆,因缘际会,一年半后又自作主张,以同等学力考取当时很有名气的新制学校私立共进中学。1929年入武汉大学文预科学习,两年后直升法学院经济学系。

(一)武汉大学求学时的自由经济熏陶

对当时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的情形,比夏道平高一年级的张培刚回忆到:“那时法学院(包含法律、政治、经济三系)教师阵容极强。就经济系而言,著名教授及其开设的课程有:周鲠生(宪法、国际法、法学院共同课程),杨端六(会计学——含成本会计、货币银行、工商管理),皮宗石(财政学),刘秉麟(经济学、货币银行、经济学说史),陶因(经济学),任凯南(外国经济史、外国经济思想史),李剑农(中

收稿日期:2017-06-18

作者简介:李晓波(1979-),男,湖北广水人,信阳师范学院讲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国经济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朱祖晦(统计学),张峻(国际贸易——含海运保险)等,可谓极一时之盛。”^[12]这些教授与当时学界整体面貌一样,经济思路是以社会主义为主流的,如刘秉麟受李大钊的影响,撰有《马克思传略》《分配问题发端》《苏俄之设计经济》等文^[2];陶因在其自编的经济学讲义中,“博采各家学说”,全面阐述了“《资本论》中的各项基本观点,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尤为推崇”^[3]。朱祖晦留学美国,宣讲的是制度学派,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当然其中也有主张自由经济的,如杨端六和任凯南。杨端六早年留学日本,后又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是一位“正统派的学者,颇有英国学者之风”^[4]。凯恩斯的《货币论》出版后,其写过书评予以驳斥^[5]。任凯南早年官费留学日本,后又考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由著名的自由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指导,回国后延续了坎南的自由经济主张(详后)。1927年被聘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和经济学系教授,1932年10月任经济系主任。但相对而言,当时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持自由经济思路的人并不多。这一时期其他大学与之类似,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湖南大学的经济学系都开设有社会主义课程,讲授马克思学说、劳工运动史和社会主义史等^[6]。

当时夏道平并不知道老师们的经济思路有什么不同,只是记得:“在我们经济学系一年级教经济学的那位先生,是刚从德国回来的。他所教的,是当时德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他还在三年级教一门经济政策,那也是从铁血宰相俾斯麦以来德国的那套玩意儿。”^[7]到了二、三年级的时候,任教的是几位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回来的教授,这其中就有任凯南。据其回忆:“在第三学年开始上课的某一天,任老师以系主任的身份带来一位新来教统计学的先生进到我们的教室,在任老师讲完几句介绍话以后,那位留美的年轻硕士在滔滔的演讲中,扯到当时美国时髦的制度学派而大‘盖’一阵。他讲完后,任老师在临走时候的讲话中又简短地以他一向结巴巴的词句,在微笑中着力点了一句:制度学派不过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后代。这句话,我当时不懂其中的含义。到后来念经济思想史的时候,从奥国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争论中,我才领悟到任老

师那句话透露了他自己的经济思路。”^[7]

任凯南在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任教期间,仅发表了一篇长达27页的论文《百余年来国际汇兑学说之演进》(《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号)和一些书评。不过,从这些书评中,仍可见其经济思路,这在1934年11月发表的书评《Applied Economics, By R. J. Bye and W. W. Hewet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原作者在书中指出现行的经济制度已有所改革,是一种限制的资本主义,“由纯粹之资本主义与集产主义相合而成”,并认为将来的经济政策“居放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而执其中”。对此,他评论到:“在今日通行之资本主义社会,固非单纯者,但在昔时,何非为驳杂者乎?不过昔时资本主义常有封建时代留遗之规范政策补其不及,而今则有由受社会主义之影响以生之干涉政策以救其流弊,此其别尔。又彼等执中之说亦有语病。自来经济制度常受一种主要之主义之支配,而以它种主义补救其穷。断无有两种主义采用势力相敌而能行之不乱者。”他还指出:“彼等仍保存资本主义之基础,则亦何有于树立社会主义而兴之并大。执中之云殊滋语病,反不如一般放任派之言,保存现制而掇其害之词旨并显也。”^[8]任凯南撰写此文时,世界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思路已从自由经济调整为统制经济,而在中国,政界、实业界和思想界广泛讨论统制经济^[9],但这篇书评表明他并未受此影响,仍然保守了自由经济思路。

大学四年,夏道平与任凯南、杨端六等老师接触较多。这段岁月多年后他回忆道:“我在武汉大学念书时,最敬佩的老师都是几位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留学生,其中除指导我写毕业论文的任凯南先生(教西洋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及杨端六先生(教货币学的)对我有过多单独指导以外,其他几位虽然在每次考卷上都给我高分,对我应有不坏的印象,但他们从未主动约见我给以鼓励和课外的启发。”^[10]四年级时,夏道平选择了以货币学为毕业论文研究方向,以费雪的货币数量说为具体研究内容。费雪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动在正常状态下会使得物价水准成比例地变动,货币流通量M,货币流通速率V,各种待售货物价格P、P'、P''……,各种待售货物的数量Q、Q'、Q''……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列方程式表示: $MV=PQ+P'Q'+P''Q''+\dots+EPQ$ 。如果用P表示物价平准,用T表示Q''的总和,则方程

式可简化为： $MV=PT$ 。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除了使用现金，还将现金存于银行而签发支票，这部分存款也影响物价，如果用 M' 表示可用支票提取的存款，用 V' 表示其平均流通速度，则方程式又可转化为： $MV+M'V'=PT$ 。方程式演变至此，费雪仍然认为货币数量 M 的变动在正常状态下必然引起 M' 的变动，结果使得物价水准成比例的变动。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各国政界和学术界仍在讨论如何解释和应对经济危机，费雪的货币数量学说可谓当时的前沿话题，因为其理论前提是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排除了货币的价值储存功能，忽视了投机所带来的金融风险，这个学说与美国大萧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所以夏道平的这个选题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这篇论文^④由五个部分组成：“绪论”、“数量说在历史上之演进”、“费雪尔数量说之体系及其批评”、“交换方程式之分析与批评”、“结论”。在“绪论”中，夏道平明确指出所要探讨的是货币价值问题：货币价值如何发生？如何变动？然后以费雪的理论为中心，追溯其思想渊源，依其体系检讨其内容，不仅反思了费雪的理论适用问题，而且还以货币数量 M 为主体，从 M 与 M' 的内容、 M 与 M' 的关系、 M 与 V 、 V' 的关系、 M 与 Q' 的关系、 P 是否是被动的等方面深入检讨了方程式，得出结论：“数量说在费雪尔以前多少有种弹性。……至费雪尔则以一贯的精神，完成数量说之系统；所谓过渡时期者，在他看来，不过是正常学说之附加条件耳。此种精神，固有助于数量说之建树，然在另一方面，因其方程式之硬性的解释，处处求符合其伪定之前题，似不免有观察疏漏或故事牵强之嫌。……总之，社会现象是人类主观的心理过程与客观的物质过程所交织。研究社会科学当然不能同自然科学一样的准确。即在自然科学中有机化学不能与无机化学同样得到精确的结论，正因为前者有生理的过程掺杂于其间。人类心理的活动较生理的过程尤为复杂。故社会科学决非一个简单的法则所可把握其中心。费雪尔惨淡经营的数量说体系所以不能完整者，其原因在此。”^⑤为写论文，夏道平多次请教任凯南老师，每次任老师“以很沈浊而又口吃的湘西口音，慢吞吞地给我的毕业论文一点一点地指教。”^⑤可见，在任凯南、杨端六的指导下，夏道平也开始认知奥地利学派，开始了解到经济活动中人的心理

因素的重要，得以埋下自由经济的种因。

（二）武汉大学任教和参军时期的统制经济倾向

大学毕业后，夏道平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他较关注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动态，写过几篇货币学方面的书评。接下来的几年，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经历了一系列变动：1936年陶因任经济学系主任；1937年7月任凯南应邀至新成立的国立湖南大学任教务长；彭迪先、陈家芷等左派教授来到经济学系任教。最重要的是，正当夏道平准备公费留学考试时全国抗战开始，1938年2月武汉大学决定西迁至四川乐山，夏道平也来到这里。助教工作之余，他仍坚持学习经济学，不仅精读了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的著作《经济学原理》，而且还翻译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霍布逊(J. A. Hobson)的《分配经济学》，并由刘秉麟教授审正^⑥，1941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霍布森的这本书是当时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在书中他一方面承袭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方面修改了庞巴维克的边际分析方法，主张用国家垄断代替私人垄断，通过税收、工人运动等方式促进公平分配和增进社会福利。这些表明，在武汉大学任助教期间，夏道平并没有追随任凯南等所启发的自由经济理论，并没有意识到经济自由与平等、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张力，思想中的经济平等元素还相当浓。

乐山邻近成都，虽说是抗战后方，但仍常遭到轰炸。在一次大轰炸中，夏道平险些牺牲。这件事对他冲击很大，觉得现代战争无所谓前方后方，于是主动请缨奔赴河南洛阳前线，任上校文职军官。夏道平参军时，二战的国际形势并不明朗，中国抗日战争正处在战略相持阶段，几年抗战下来有些人已产生消极情绪，汪伪政府的成立就是明证。参军以后，他较关注国际战争形势，用笔杆子为抗战将士们鼓劲。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研判国际战争形势的过程中，夏道平又清晰地表达了经济思路。

例如：苏德两国原本签订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6月条约还在有效期内，两国竟兵戎相见，夏道平很快发表观感：“当日的订约与今日的宣战，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演出。这是极权国家行动的特点，极权国家的杰作。”^⑦1941年8月，他又撰文反思以德国为代表的纳粹经济。当时学界对德国纳粹经济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部分人尤其是自由主义者认为纳粹经济制度是不健全的，德

国金融很快就会崩溃,汽油等原料将会缺乏,战争因此会受到影响;一部分人表示相信纳粹经济计划是天才的作品,德国经得起战争,能够解决任何经济问题。对此,他指出:“这两种看法,似乎都不免失之于偏。我们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在目前纵然不能全盘推翻,至少也应加以相当的修正。同时,我们也认为:戈林不是天人,在他所主持下的经济计划,也决不会是万全万能,永久不会出毛病的东西。”^[11]纳粹经济机构像汽车装置厂一样,各部门的配合非常严密,这固然可以减少浪费和增进效率,但由于“纳粹经济机构,就像一部大机器,可惜这部大机器的构成部分都是有意识的人,而不是‘机器人’。发动这部大机器的,也是有意识的人,而不是一座蒸汽机或发电炉。人有理智,也有情感;人有正确的思考,也有错误的判断。这是‘人’之所以为‘人’。详言之,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理想中的万全万能的‘天人’的地方,也就是‘人’之所以异于无理智无情感无意识的木石的地方。因此,我们不能说,各部门的经理或工程师在工作中绝对不发生无意的错误或有意怠忽。在一个组织特别严密的机构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某一部门的主持人在工作上有一错误,也许会严重地影响到其他各部门,至于主持总计划的人,如果思考不正确,计划乖谬,其影响更不易于挽救”^[12]。纳粹经济制度丝毫没有弹性,既像铁一样硬,又像玻璃一样脆,经不起打击,所以潜伏着很大的危险。这些表明夏道平在从军时期,调用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资源,强调人不是无意识的机器,而是有意识、有心理活动的,用以反思高度计划的德意模式和苏联道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此时他选择自由经济,相反,他认为英美传统的自由经济应有所“修正”,表现出统制经济^⑦的倾向。

(三) 国民政府任职期间的统制经济初步反思

抗战以前,当中国思想界和实业界还在讨论何谓统制经济、如何实施统制经济时,国民政府已开始实施统制经济,1933年设立了第一个统制机构棉业统制委员会,1935年成立资源委员会,统制重工业和工矿产业。抗战发生后,统制经济几乎成为国人的共识,而国民政府为应对战争,逐渐确立战时统制经济体制,统制措施又有所加强,范围逐渐扩展到统制财政、统制金融、统制生活物资、统制外汇等。1943年战区人事变动,夏道平转回重庆,进入

国民政府的战时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任经济建设策进会研究室主任(顶头上司是国民参政会的副秘书长雷震)。在审阅民间申诉文件和拟定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对于当时经济管制的流弊,增加了一些实际的认知。”^[178]但对经济管制何以会带来流弊,还没有深入的反思。这一时期,他忙于实务,所发表的文献较少,目前所查到的仅有两篇:一篇是书评《马著经济学概论》(《新经济》第8卷第11期,1943年),还有一篇是《工业关系》(《中国工业》第30期,1945年)。《工业关系》是一篇译文,原刊《伦敦经济周刊》1945年2月17日。文中所讨论的是战时英国为发展生产而临时组织的旨在协调劳资关系的联产会,联产会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工会与雇主的紧张关系,促进了工业关系,战后雇主们认为应取消,而工会认为应保留和继续存在。原文作者指出,虽然工业关系日趋复杂,工业和政治一样,内部必须要有一定的支配权,但工业关系还是应有所改进,工业统制不可太多,不可固步自封、不求改进。此文实为二战快结束时,英国反思统制经济的表现。夏道平选择翻译此文,也表明此时他开始反思统制经济,但是其经济思路的方向并不明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民参政会不再设立,夏道平又进入经济部任参事。在此期间,有一次去雷震家聚餐时认识了大名鼎鼎的胡适(胡适和雷震后来在台北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夏道平应邀当编辑,这可能是原因之一)。抗战胜利后,中国迎来了和平建国的契机,国共两党一度为此进行谈判,但最终还是陷入内战局面,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重要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民政府接连公布了一系列方案,如《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经济动员纲要》《新外汇贸易方案》《国营事业配售民营办法》等,结果不仅未能挽救政治经济危机,反而由于官僚资本的膨胀、政治的腐败造成政治经济总崩溃,1949年4月国民政府被迫迁至广州。此时,夏道平选择脱离公职,“打算在民间做点有意义而可谋生的事情,再也不要进政府机关任公职。”^[1138]他是这样想的,后来也是这样做的。

二、《自由中国》时期的自由经济转向

夏道平是怎样来到台湾的,至今没有详尽的资料,但时间是1949年。赴台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在王云五创办的华国出版社当编辑,同时还与雷震等

一起筹备《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正式创刊,胡适任发行人,雷震任社长,马之骥任经理,夏道平与雷震、殷海光、张佛泉、聂华苓等一起任编辑。

《自由中国》的创办是自由知识分子与开明国民党人的结合。这种结合中,自由主义者原本想用胡适的名义来控制刊物的编辑权,可是由于当时属于开明国民党人的雷震强势主导,也由于自由学人的介入不够积极,更由于他们本来就意在帮闲,所以创刊后的一年多时间,《自由中国》与官方相当亲近^{[12][13]}。《自由中国》与当时台湾其他报刊一样,大多站在官方的立场讲话^[13]。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台湾由此转危为安。此后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两蒋逐渐背离宪政承诺,日益走向威权。《自由中国》中的自由主义者和国民党的开明派对此皆不以为然,遂与之决裂。

在此背景下,1951年6月《自由中国》果敢发表了夏道平撰写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文中讲了一件“怪事”:有人在土地银行开立一个户头,土地银行给这个户头发本票(本票都是见票即付的,但土地银行开给这个户头的本票都是期票),于是这个户头就利用这种本票作抵押,到处以高利率向人借款,每等到借贷成交的时候,保安司令部总能一并破获。这类案件被公开有五起,人犯达二十余名,全部案款有台币一百一十万元,抵押品都是土地银行的本票。社论提出三大疑点:第一,“在土地银行开立户头的是什么人?……一个普通人怎么会有一百多万的巨款摆在银行内?如果说该户头可以透支,透支的限额是多少?大量的透支即是信用放款,信用放款是须要担保的;是谁担保?是哪个公司行号担保?或者是什么物品担保?而且在现行的金融管制办法下,银行信用卡已严格地被控制住,不是银行本身可随意做的”;第二,“目前银行存款利率最高的月息不过四五分。但这五件借贷案中,最高的月息达到二角六分,最低的也有一角二分。我们试想想,……以存款换得的银行本票向别人抵押借款,而承担高到好几倍的月息,天下哪有这样的傻瓜做出这样的大傻事?”第三,“‘保安司令部’军事检查官提出的起诉书,叙述到‘犯罪事实’时,无一处不提及借贷人的姓名。……但在叙述借贷行为之发生和经过时,完全不提及借款人的姓名,似不免有故意掩蔽之嫌。”他的最终推论

是:这是“政府诱民入罪,至少是政府中某些机关办事人员诱民入罪”,“政府诱民入罪”的真正动机在于套取高额办案奖金:“依照金融案件提付奖金的办法,告密人的奖金是全部案款的百分之三十,承办单位的奖金是百分之三十五,这样的暴利而又不不要本钱的生意,恐怕为民间任何投机生意所不及吧!”^{[14][34-35]}

社论发表后,当时负责执行金融管制的“保安司令部”极为愤怒,“督察处长”陈仙洲出面发表谈话时,不仅没有直接答复社论所提出的疑点,反将非法金融活动与匪谍联系在一起,要求新闻界合作以维持当局威信,私下还安排陶希圣代笔写了一篇赞同金融管制的社论在《自由中国》上发表。远在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致信《自由中国》:“这篇文章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14]37}事件最后在“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干预下平息了下来。这篇社论标志着《自由中国》全面自由主义化^{[12][37]},于夏道平本人而言,也有深刻意义,意味着他开始从一个开明三民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服膺经济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多年来深埋的自由经济种子也在环境的诱发下由此发芽。

“自由依赖于极为平凡的小事。”^[15]《自由中国》时期,夏道平的政论文章随着可批事象的增多而增多,而且越来越率直、严厉和深入^⑥。文字虽绵密细致,但从不在枝节问题上作隔靴搔痒式的讨论,而是特别注意较长远的打算和问题的根本解决。《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之后,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经济学出身优势,又撰写了多篇社论,从政治、行政、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批评当局的经济管制,阐发自由经济主张。

经济方面。迁台初期,当局为安抚人心和恢复发展生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土地改革是其中之一。土地改革分三步完成: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进行到第三步时,由于财政不足,如何将地主手中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成为一大难题。当时台湾当局拥有大量的公营企业和党营企业(源于对日产企业的接管、迁台企业、当局独占经营企业、国民党直接投资的企业等),这些企业大都机关化,内部管理较乱,浪费多,效率不高,与真正的企业相差很远。为使改革顺利进行,陈诚倾向于

购买的办法,当局先后通过《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和《实施耕者有其田法》,具体方案是用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实物债券与地主换土地。陈诚的这种做法引发了一场公营民营大辩论,很多民间和党政人士都参与其中^⑨。辩论中蒋介石选择支持陈诚的做法^⑩。作为试点,1955年春台湾水泥、纸业、农林、工矿四家公营企业转为民营。这个改革得到了夏道平的赞同:“国营事业的浪费和效率低,已是大家熟知的事实;改归民营后,由于私人企业心的发挥,这些缺点可以大大改进。”与此同时,他还勉励民营事业发挥奥地利学派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民营事业的生存和发展,要靠经营者充分发挥其企业精神,从技术与管理方面力求改进。”^{[14]125-126}由于技术的改进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他又希望民营企业率先丢掉衙门习气,以推行科学管理为第一要务。

政治方面。台湾当局虽允许部分企业改为民营,但总体上仍然固守“国营企业”思维。当时台北大法官会议有一项法律解释认为,无论是政府投资经营的,还是公私合营的,只要是称为“国营事业”的公司转投资于其他事业的资金一律视为政府资本。夏道平注意到如此辗转投资下去,政府资本在所转投资的事业资本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将越来越小,可能的后果就是国营的范围日益扩大,民营则日益缩小,政府资本将以小吃大。^{[14]111-112}从这个具体政策中,他看出了政治与经济关系之大:“对于政治经济问题,我们一向有些坚定不移的信念。其中,我们认为:政治民主是要以经济自由为基础的。生产事业的国营,只有在资源稀少以免私人垄断的情况下,才有其必要;过了这个限度,国营事业愈扩张,政治上的民主就愈萎缩。……我们确信,一国的政治趋势,趋向民主或趋向极权,也可以从国营事业的伸缩看出来。”^{[14]125}

行政方面。两蒋治下的台湾地盘不大,但机构庞大、庞杂,不仅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还妨碍行政效率。以财经机构为例,原本设有“财政部”和“经济部”管理财政和经济行政,后来又增设“经济安定委员会”、“美援运用委员会”和“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等,把财经权力分割得乱七八糟,与这些管理部门接触过的民间工商业主无不感到头疼。夏道平对此批评到:“骨子里的理由,是要回避责任。是要造成财经两部有责无权,而这些委员会有权无责的局面。这样才好上下其手,才好便宜行

事。有利,不妨你争我夺;有过,又可你推我诿。”“苛烦的管制政策、干涉政策,已经把民间工商业桎梏得喘不过气来。……现在民间工商业最伤脑筋的问题,不是如何减低成本、改良商品、在市场上争取消费者,而是要不要鬼鬼祟祟走进官方的旁门左道。”^{[14]195-196}

军事方面。1957年8月《自由中国》以“今日的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夏道平反思的是军事问题。在他看来,军事问题对当时的台湾极为重要,因为当时存在一个难解难分的死结:“政治害于经济,经济害于财政,财政害于军事。……如果军事问题有适当的解决,财政问题就比较容易着手;财政问题减少,经济问题也比较好办;从而政治与其他问题的讨论,才不致是废话。”^{[14]187}这种判断绝非虚言,当时两蒋为反攻大陆仍保持60多万人的常备军,结果财政无力承担,庞大的军费支出大多与军事无关,官兵薪饷所占比例较小。考虑到美国第七舰队仍驻守台湾海峡,并无助台反攻之意,他指出军事问题应面对现实作最有利的打算,第一步就是大量裁军,“裁军的重心,当然是在陆军方面。现在陆军的成分,台湾省籍的兵士,将近半数。他们退为后备兵以后,可以回家自理其原有的生计,无须政府负担生活;至于大陆省籍的,政府使其就业于农工生产部门。这样一来,常备兵的人数既大为减少,则待遇可以相当改善。同时在生产部门由于劳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增加,再配以其他条件(最重要的如解除经济管制的重重桎梏,让民间企业得以发展),则台湾经济的前途,就可有繁荣的希望。”^{[14]189}可见,在夏道平那里,自由经济对于解决台湾军事问题有着特殊意义。

《自由中国》时期,夏道平不仅从细微处鞭策经济自由,而且还公开揭发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说。武大校友詹绍启从《自由中国》的言论中早已知道夏道平是反对经济管制,主张经济自由的,1957年上半年寄来一本英文杂志《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其中一篇题为《What's Behind the War on Business》的文章预告了米塞斯的新著《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美国D. Nostrand Company Inc.1956年10月出版),夏道平很快将内容摘要翻译出来,以“反资本主义的心理”为题在《自由中国》上连载。这本书是米塞斯多年来对美国社会亲身观察的结果,书中“把美国知识分子、白领工作人

员、专门职业者等反资本主义的心理,描绘得惟妙惟肖,分析得合情合理”^[16]。详细讨论了反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心理因素如平等、正义诉求等,试图澄清被误解的资本主义,结论是市场经济、自由企业等名词与资本主义所指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不过着眼点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想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享有充分自由,那么就必须依赖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运作。这本书篇幅不长,通俗易懂,出版后在美国很畅销,每两年就会重印一次。夏道平刚开始翻译时只是节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刊登在《自由中国》第16卷第1~4期,后来又印有单行本。1957年秋他又将此书全部译出,为强调原书论旨,特将书名改为《被诬蔑了的资本主义》。他没有想到的是,“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征得自由中国社的同意,将译稿列为《经济丛刊》出版发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卖了不到几天,工业委员会就告之此书受到外来干涉,将删节改版。至于如何删节改版,他一无所知。经再三催促,直到1958年2月才拿到删改本,发现原书已由72页删至52页,“译者的话”不仅删去4段,而且还在结尾擅自添加了一段话。他对此很气愤,特刊登启事表达抗议。此后,工业委员会托“经济部”参事高叔康向他请求原谅,《被诬蔑了的资本主义》的全译本和删改本都没有继续再发行。

《自由中国》时期,夏道平所写的政论文章不仅表达了当时人们的正义呼声,而且有的还收到了实际的政治效果,如迫使俞鸿钧及其内阁倒台等。自由经济方面的努力也没白费,台湾当局虽然时至1957年仍是管制经济思维,此后的事实是1958年历经外汇改革大讨论,财经政策悄然发生变化,主政的尹仲容部分吸收自由经济学家的意见而开始改革。当然,这些政论文章更多的是引起当局的不满。从1959年开始蒋介石为三连任“总统”费尽心思,自由中国社多次刊文批评,夏道平也撰写了多篇社论:《蒋“总统”不会作错了决定吧?》《好一个舞文弄法的谬论——所谓“修改‘临时条款’并不是修改‘宪法’本身”》《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等,文中他力劝蒋介石学习华盛顿和杰斐逊所开创的优良传统:华盛顿总统任期满两届后主动放弃续任总统的机会,杰斐逊在总统任期内厉行民主政治。但这些诉求终为威权所不容,1960年9月4日当局指控《自由中国》“涉嫌叛乱”,将发行人雷震等

逮捕法办,《自由中国》由此停刊。为救出雷震,夏道平与殷海光、宋文明等人联名发表《〈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在台北各大报刊上刊登,说那些“涉嫌叛乱”的文字大都是他们写的。那是一个抓人杀人不眨眼的时代,当他们共同署名发表声明的时候,他们都做好了被抓的准备,表现了知识分子大义凛然的担当。

三、《自由中国》停刊后自由经济思路的深入探索

《自由中国》时期,夏道平的经济思路虽然已有所转进,并清晰地将经济自由看成民主宪政的必要条件,但其言论重心毕竟在民主宪政。《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夏道平转到讲台,先后在台湾政治大学、东海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和铭传商专等校任教,用他那低沉的湖北腔调讲述《经济学英文名著选读》等课程。由于没有了发表言论的地方,他对当时实际政治中的一些枝节问题不再感兴趣。不过,其自由经济思路延续了下来,如1961年12月他翻译了John F. Due和Robert W. Clower的著作Intermediate Economic Analysis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在“译者的话”中他指出:“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看,‘福利经济学’这个名词,译者总觉得大有问题。尽管有许多经济学的权威使用这个名词,我迄未被他们说服。科学就是科学,无所谓福利非福利。我们可以应用科学来谋福利,但科学的本身不应该冠以‘福利’这个形容词。”^[17]

那时,夏道平仍住在台北和平东路的华国出版社内,距离殷海光的家不远,课余时间常找殷海光谈学问谈思想问题。据聂华苓回忆,夏道平找殷海光“谈民主、谈自由、谈哈耶克、谈罗素、谈自由经济”^[18]。这一时期,夏道平还广泛阅读奥地利学派的著作,如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到奴役之路》和《自由的宪章》等,1965年写出长篇论文《海耶克教授经济思想的简介》,指出“海耶克经济思想的结构,是嵌合在他的自由哲学整个体系中。个人尊严、个人自由,是他全部思想的基设,当然也是他经济思想的基设,从而形成了他的对于现行若干经济政策的批评”^{[17]107}。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由中国》学人逐渐远去,夏道平开始寂寞起来。

在这段寂寞的日子里,他的思想世界其实并不寂寞。他开始有时间埋首于奥地利学派的经典著作中,与大师们谈心,又译有米塞斯的著作《经济学

的最后基础》《人的行为》和哈耶克的论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还译有自由经济学家洛卜克的著作《自由社会的经济学》。米塞斯的《经济学的最后基础》给先验论以适当的地位，强调宇宙间有些东西是自然科学所不能描述和分析的，在自然科学所可观察和描述的范围以外还有别的东西，那就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长达八十万言，集中展示了鲜明的经济自由主义立场，认为经济学是人的行为通论或行为学的一部分，经济学所处理的是实实在在的人，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举凡市场、竞争、自由、价格、成本、货币、时间、储蓄、利息、利率等，在书中都有详尽论证；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不仅讨论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而且还论述了纯粹的经济理论和实际经济问题；洛卜克的《自由社会的经济学》则是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性质的著作，其中肯定了奥地利学派的核心观念。译了这些书以后，夏道平更深切、周延地理解了经济自由，“笃定”了自由经济思路^[1197]。

客观而言，夏道平当时所潜心翻译的奥地利学派并不合时潮，因为二战后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凯恩斯主义，受此影响，台湾当局财经官员一直迷恋凯恩斯主义的那一套，藉通货膨胀创造有效需求，促进就业和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学界有很多人依赖计量模型来处理经济问题，对于不能量化的复杂事象要么强行量化，要么无视其存在；经济学教科书充斥着凯恩斯主义的数字表、代数式、几何图形和经济学模型，几乎看不到人的心灵活动。此外，在经济制度方面，台湾当局则一直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指导，当时主持财经的李国鼎在解释时指出，民生主义所指示的经济政策是：“‘富而均’，不是‘均而富’。所谓‘富而均’，系着重在‘富’，而在致富的途中兼求其‘均’。”^[119]为实现此目标，当局多次进行赋税改革，如1956年实行单一所得税改革，个人所得和企业营利所得都按累进税率征收^①。

当社会各界打着平等、贫穷、福利、公平正义、经济成长、就业和社会安全等旗帜，主张当局干预经济的时候，夏道平不愿沉默，经常运用奥地利学派撰文加以批驳。

1965年1月夏道平撰文告诫当局，不用过分依赖所得税^[20]。此后，又以个人所得税为例从理论和事实两个层面反思累进税，指出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给以差别待遇，而且是任意的差别待遇，有违民

主法治原则；征收复杂，不仅加重税务行政费用，而且可能会鼓励贪赃纳贿、逃税偷税；“累进税的主张者总以为它可以减轻经济的不平等，可是，事实上它在这方面却保障了既存的不平等。”^[171203]他推举递减的累进税，两大要件是法定税率和有客观标准的免税额，法定税率可参考政府在国民收入总额中拟课税的百分数来规定，免税额则可依照一时一地的最低生活费用来确定。这样在征税的时候，实际税率就以递减的方式累进。

1977年3月夏道平在《铭传学报》上发表长篇论文《平等与经济平等》，系统地检讨了经济平等的问题，指出平等只是在近代才成为一个社会目标或理想，但近代人的平等观念却很模糊：“近代人所向往的平等，大都着重于经济平等。他们似乎认为：经济平等是其他一切平等的必要条件。如果经济不平等，则所谓政治平等、社会平等，……都会有名无实。这个说法是把平等问题看得过于简单。”^[17139]在他看来，经济平等既不能促进经济成长，也不能增进经济福利，“人民经济福利的增进，不在于所得分配的平等；恰恰相反，所得分配的不平等，反而可以保证人民经济福利的不断增长。”经济不平等有益而无害，“在分配不均的社会，总会有人不满意的。但‘不满’并非完全是坏事，‘不满’有时是‘希望’的化名。希望可以促成进步。如果消除了所有的不满（这当然是个绝对不可能的假定），也即消除了所有可能的进步。但是，如果不满与不公平的错觉相结合，那就会酿成社会动乱；动乱的归趋，大概就是一个奴役的社会。”^[17169]其结论是：平等是有界域的，在平等议题上，应当坚持的是人格平等、法律平等、原则性的机会平等，应当反对的是结果平等、实质性的经济平等；贫穷问题不宜与一般的经济不平等混为一谈。

1979年至1980年间台湾出现较大的通货膨胀，围绕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和应对之策，蒋硕杰与王作荣展开笔战，是为著名的“蒋王论战”。夏道平也发表观感，认为在讨论经济问题时理当有一些共识，如恪守市场法则、维护货币纪律、重视长期分析和尊重经济理论等^[11228-234]。此后，他还撰文专门检讨凯恩斯的理论，指出凯恩斯的著作缺乏必要的社会哲学基础，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上，只是从技术效率层面考虑社会问题，“这本书所讲的，自始至终只讲物质的生活资源，从未讲到

人之所以为人也要靠精神食粮。在这本书中,找不到丝毫的‘人影’,所以这一本书是把人完全物化了。”^[160]凯恩斯理论下的通货膨胀与以前不一样,它是一种温和的膨胀,更是一种加速的膨胀。这种膨胀稍一停止或减缓,接着就是更大的膨胀。这种膨胀不仅不是促进充分就业的有效手段,而且其代价是相当惨重的:“以通货膨胀的手段来解决失业,更造成比原来的失业量更大的潜在失业而终会爆发出来。”最严重的危害在于,“如果照过去一样,膨胀稍一停止或减缓,接着就是更大的膨胀。如果继续下去,势必膨胀到市场经济的一切机能终于全盘解体。”^[17125]

退休后,夏道平接受蒋硕杰的邀请,任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从事《经济前瞻》季刊编辑工作。当时,台湾当局、舆论界和学术界都在高喊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声音虽一样,但内涵并不相同,至于具体做法更是五花八门。为澄清观念,1986年他撰文指出市场秩序是“经由市场供需法则所形成的价格体系之指引,生产资源会用在最有效率的途径”。将市场秩序和丛林法则混为一谈,甚至漫骂市场秩序是不对的,因为“那些被指责的事象,很多不是市场运作的结果,仅仅是在市场上浮现出来而已;它们的根源另有所在。而且,把它们都归咎于市场的那些说辞,其中还不免有些观念混淆,有些情绪参杂”^[171268-269]。1988年8月时值哈耶克所发起成立的蒙贝勒兰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准备在台北召开特别会议之际,他特意撰文宣传这一独特的国际民间学术团体,并突出强调学会的一大宗旨——维护市场机能及其原创力,以鞭策当局切实实行宪政民主和经济自由政策,其中讲到:“对于市场机能理解愈深,对于自由民主的信念愈是坚定;而且对于自由民主的实际运作是否得当,也会有愈正确的辨认。”市场机能不容干扰,也就是经济自由的另一种说法,“经济自由是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所以凡是志在促进自由民主的人士,必须耐心研究市场机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171263-264]仅仅强调“政治回归宪法”还不够,他还大声呼喊“经济回归市场”^[1149]。

1989年由于年老病痛,夏道平回家静养。1995年12月23日这位致力于台湾自由民主、为自由经济散播种子不遗余力的哲人安详辞世^[211]。

四、夏道平经济思路演变的原因

综观夏道平一生经济思路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虽然早在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求学期间,就已通过业师任凯南和杨端六等人的指导而了解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埋有自由经济的种因。但是在武汉大学任教和参军时期,不仅没有跟随任凯南等启发的自由经济思路,相反由于思想中的经济平等元素浓厚,主张对自由经济进行相当的修正。在国民政府任职期间,思想开始有所转进,但方向并不明确。这种经济思路的断裂,显然与当时中国思想界有着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更为浓厚的社会主义思潮,国民政府为应对世界经济恐慌和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加紧实施统制经济相关,当然也受到当时经济学系老师变动的影响。

去台后任《自由中国》主笔期间,夏道平之所以得以转进到自由经济思路,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因为“亲身体会到种种反自由的政权为害之深而燃起的”^[1719]。当时,台湾当局在政治方面严格执行戒严,在经济方面则以经济混乱为借口而采取全面的管制措施。《自由中国》创刊之初,自由中国社学人在思想上继续持守经济平等的思路:“一面口头上力争政治自由,另一面又否定经济自由,甚至歌颂毁灭自由的计划经济,很少意识到放弃经济自由之严重后果。”^[1221]面对这种情形,他不仅“燃起”政论热情,而且还积极寻求思想资源,奥地利学派正是在此时被发现的,多年来深埋的自由经济种子也在时代环境的诱发下由此发芽。

需要注意的是,195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的经济思路有所调整,这表现在尹仲容主持财经时,从台湾现实考虑重新诠释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不废弃私有财产制度;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但不抹杀自由经济下的私人企业精神。”^[1231]为把台湾建成一个可以和香港竞争的自由贸易地区,采取了很多财政金融措施,如批准《十九点财经改革计划》,颁布实施《奖励投资计划》,将经济战略从进口替代调整为出口扩张,这些措施促成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但在尹仲容逝世后,台湾当局重回贸易保护政策,进行经济管制,经济自由化思路不彻底。这些构成了夏道平在《自由中国》停刊后,继续译介奥地利学派,并将奥地利学派应用到具体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时代动力。

当然,夏道平在转向自由经济的过程中,也受

到自由中国社学人的影响。《自由中国》创刊后,为讨伐两蒋威权和经济管制措施,夏道平不仅积极论政,而且还燃起钻研自由理论的炽烈热情。当时积极钻研自由理论的还有殷海光和张佛泉,殷海光研究哲学,长于逻辑和思想文化,张佛泉治政治学,著有《自由与人权》。虽然所学不同,但夏道平仍以他们为楷模:“两位努力治学的精神和其路线,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对于我有不少的激励和启示。”^[179]夏道平是学经济学的,在他们的激励和启发下,选择了阅读经济自由主张最为彻底的奥地利学派。当时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这就是周德伟。周德伟是哈耶克的亲传弟子,20世纪30年代初学成回国时,“已熟识海耶克之初期著作,对于其集体主义之经济,凡反驳社会主义之论据尤为娴熟,其时米塞斯之Gemeinwirtschaft(英文本后出,译为《社会主义》,其实乃反对社会主义之巨制)已经出版,余已熟读。”^[124]1947年就已得到哈耶克的著作《The Road to Serfdom》。赴台后任“财政部”关务署署长,但他做官不忘学问,著有《经济政策与经济学理》等书,同时还任《自由中国》的社外撰稿人,从1951年底开始就在其住所尊德性斋(现改称紫藤庐)定期主持学术聚会(后因特务干扰半年后停止),研读外国自由主义经典,殷海光、张佛泉、徐道邻、夏道平等经常参加。1953年殷海光译成《到奴役之路》正是周德伟的推荐。退休后,周德伟潜心翻译哈耶克的著作《自由的宪章》,夏道平与他交往密切,每周面谈一两次,这种交流无疑有助于认知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

夏道平转进到自由经济的思路,并得以深入探索自由经济,其机缘除了武汉大学求学时埋下的自由经济的种子、自由中国社学人的影响和台湾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还有国际思想大背景。这就是二战以后苏美争霸的冷战时代的到来和欧洲实行左翼政策弊端的呈现。二战的严峻形势将社会主义苏联与自由主义英美暂时结合在一起,共同应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挑战,战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矛盾迅速上升,成为世界性冲突的根源。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米塞斯和哈耶克师徒,早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潮流行的20世纪上半叶就已首举义旗,与兰格等辩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何以可能问题,指出国家管制经济将会使人民走上奴役之路,力证只有

自由经济才能确保政治民主。但在社会主义风潮劲吹下,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并不为人所重。冷战时代的开启,终使西方的思想界发现到这一学派的价值^{[121]155-156}。《自由中国》敏锐感知了国际自由主义思潮中的新动向,第2卷1期就译有米塞斯的文章《社会主义与专制》,其“译者言”称:“密塞斯教授是维也纳经济学派的领袖,有名的海也克教授便是他的学生。密氏早就指出,国家管制经济,早晚会造成专制极权的警察国家。”^[125]第9卷至第11卷分11次连载了殷海光译述并夹叙夹议的哈耶克作品《到奴役之路》。

从实践看,二战前后西方一些国家先后实行了社会福利政策,英国工党上台后更是将银行、铁路、电力、钢铁等收归国营,但效果并不理想。《自由中国》有作者指出:“社会主义给英国带来的并不是先前所预期的繁荣,而是匮乏和重税。”国营的结果是样样都赔钱,为充分就业,个人宝贵的择业自由也被取消了。受英国的影响,法国在战后也实施国有政策,结果发现“效率低落,生产减少,赔钱等情形,和其他作社会主义尝试的国家,如出一辙”^[126]。后来,法国政府又将这些企业转回民营。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的情形大致与英法类似。自由中国社的其他一些作者则注意到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这些成就归功于美国实行的自由经济制度,驳斥那些对自由经济制度的批评^[12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后西德和日本由于实行自由经济,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并走向繁荣;英美等国战后由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结果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凯恩斯主义不能解释和应对的滞胀局面。在此背景下,主张自由经济最为彻底的奥地利学派因势而起。夏道平原本就对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和其相关的社会哲学有浓厚的偏好,奥地利学派的理势变化,无疑更增加了他的信心。总之,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资源是夏道平转向自由经济,并得以深入探索自由经济思路的重要原因。

注 释:

- ① 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有:何卓恩:《自由与平等:〈自由中国〉时期殷海光、夏道平对政经关系的反思》《夏道平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证成》,参见何卓恩:《自由主义的新遗产》,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143页;邓文:《夏道平对自由的厘定与阐发》,《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8年第6期,但夏道平经济思路的演进及其原因仍需系统讨论。
- ② 刘秉麟:《马克思传略》,《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分配问题发端》,《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苏俄之设计经济》,《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4号,1931年。
 - ③ 参见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262页;陈雷:《经济与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统制经济》,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72页。
 - ④ 夏道平的这篇论文完成于1935年,经修改后发表在《四川经济月刊》1937年第7卷第3、4期。本文以正式发表的为准。
 - ⑤ 参见夏道平:《石屋二老》,《夏道平文存》第3册,第124页;夏道平:《尽早培养诚实写作的习惯》,《夏道平文存》第3册,第214页。
 - ⑥ 参见霍布逊:《分配经济学》,夏道平译,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译者序”,第5页。
 - ⑦ 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不同,这种不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学人指出,如穆青认为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组织单位不同:前者是国家,后者是在国家与实业团体之间;主义不同:前者是资本主义,后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不同:前者是私有制,后者是公有制;范围不同:统制经济虽包括一切经济活动,但不必有统一的整个计划,政府居指导地位,统制主体是各实业团体,计划经济注重全国生产的整个计划,参见穆青:《统制经济之研究》,《商学期刊》第8期,第2、3页。林艺伟说的更清楚,“这两种政策的区别,不在于名词或实施的方法上,而是在于立场和目的上。”参见林艺伟:《统制经济理论的检讨》,《民钟季刊》创刊号,第129页。
 - ⑧ 《自由中国》总共出刊249期,社论429篇,夏道平写有116篇。此外,还有不少是以本名或笔名写的和译的以及早期刊出的若干短评。
 - ⑨ 参见郭岱君:《关键的年代——台湾现代化的进程与反思》,《南方都市报》2011年9月25日,第A II 20、A II 22版;郭岱君:《半个世纪前台湾改革路径选择的大辩论》,《南方都市报》2013年3月25日,第A II 20、A II 21版。另可参见 Kuo Tai-Chun, Ramon H. Myers: *Taiwan'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Leadership, Proper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Routledge press, 2011。
 - ⑩ 蒋介石原本是主张计划经济的,但二二八事变促使他开始反思计划经济,参见 Kuo Tai-Chun: *A Turning point for Taiwan*, Hoover Digest, 2009(2)。
 - ⑪ 台湾当局为让税收承担起民生主义的均富任务,在1968年进行的赋税改革中,将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进一步上调。
- 参考文献:**
- [1] 夏道平.夏道平文存(第3册)[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
 - [2] 张培刚.感恩母校 怀念老师[C]//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武大校友通讯(第2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42-43.
 - [3] 袁征益.追忆陶因教授[C]//龙泉明,徐正榜.老武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111.
 - [4] 溪香.杨端六先生[C]//龙泉明,徐正榜.老武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114.
 - [5] 杨端六.读凯恩斯货币论[J]//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1,(2):375-389.
 - [6] 李翠莲.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120-145.
 - [7] 夏道平.夏道平文存(第2册)[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
 - [8] 任凯南.Applied Economics, By R. J. Bye and W. W. Hewett [J].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4,(4):887-889.
 - [9] 夏道平.费雪尔货币数量说之检讨[J].四川经济月刊,1937,(4):46-47.
 - [10] 夏道平.从苏德战争谈到未来的国际社会[J].北战场,1941,(1):23.
 - [11] 夏道平.轴心国家的经济机构:论纳粹经济及其经济机构[J].北战场,1941,(5):2-4.
 - [12] 何卓恩.《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M].台北:水牛出版社,2008.
 - [13] 邢慕寰.大道之门硕果仅存——追念夏道平先生[J].经济前瞻,1996,(3):106.
 - [14] 夏道平.夏道平文存(第1册)[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
 - [15] 哈耶克.自由宪章[M].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0.
 - [16] 夏道平.《反资本主义的心理》译者的话[J].自由中国,1957,(1):23.
 - [17] John F. Due, Robert W. Clower.福利经济学[M].夏道平,译.中国经济,1962:135.
 - [18] 聂华苓.夏道平的微笑——《自由中国》轶事[N].中国时报,1996-03-02.
 - [19] 李国鼎.台湾的经济计划及其实施[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20.
 - [20] 夏道平.不用过分依赖所得税[N].时与潮(复刊第178期),1965-01-08.
 - [21] 吴惠林.自由经济大师神髓录(修订版)[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5:321-322.
 - [22] 周德伟.对于海光先生评介《经济政策与经济学理》之商榷[J].自由中国,1952,(5):29.
 - [23] 茅家琦.台湾经济政策轨迹[M].台北:台海出版社,1998:33.

- [24] 周德伟.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M].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11:447-448.
- [25] 密色斯.社会主义与专制[J].自由中国,1950,(1):28.
- [26] 欧阳宾.社会主义的虚妄[J].自由中国,1951,(7):14-15.
- [27] 王聿修.一个自由经济制度的成就[J].自由中国,1950,(1):5-6.

(责任编辑:许桃芳)

The Evolution and Causes of Xia daoping's Economic Thought

LI Xiao-bo^{1,2}

(1.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China;2.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4,China)

Abstract: Xia daoping, who went to Taiwan from Chinese mainland in 1949, was famous for proposing free economy. However, it was a tortuous process for him to guarantee the thought of free economy. When he was study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in Wuhan University, Xia daoping has learned about the free economy. Instead of keeping following the train of this thought after his graduation, he insisted that the free economy should be considerably amended. During being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Free China, Xia daoping started to advocate the Austrian school and turned to insist on the free economy. After the journal of Free China was forced to shut down, Xia daoping translated some works of the Austrian school and got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free economy. The cause of this evolution could be attributed to his individual effort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olleagues of Free China Society. What's more important, it could be due to the changing of era environment and the provisions of the Austrian school.

Key words: Xia daoping; controlled economy; free economy; evolution